

PEOPLE
MEDIA
SOCIETY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Social Life, Regional Culture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人·媒介·社会
互动与发展

当代媒介环境下的社会生活
地域文化与人类传播考察

张志 王晓英◎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PEOPLE
MEDIA
SOCIETY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Social Life, Regional Culture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人·媒介·社会
互动与发展

当代媒介环境下的社会生活
地域文化与人类传播考察

张志 王晓英◎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媒介·社会:互动与发展 / 张志,王晓英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 - 7 - 5660 - 0291 - 4

I. 人…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②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D633②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511 号

人·媒介·社会:互动与发展

主 编 张 志 王晓英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发行部) 传 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47.25

字 数 7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291 - 4

定 价 118.00 元

**本成果受到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前　　言

本书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之后取得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本书在结构上遵从了新的分析范式,即“媒介—人—社会”分析范式。这是因为进入媒介化社会以后,媒介、人、社会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开放、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打破了原本各自独立运行的格局。新范式将三者的关系结构视为由三个主控变量相互作用的磁场。在这一磁场中,媒介经过技术变革的历程,以相对独立于人类的方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与此同时,媒介在“媒介—人—社会”这三者相互作用的磁场中,形成了可以统称为“媒介性”的媒介传播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磁场中,媒介·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过程不断持续展开,其具体传播形态涵盖了个人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人、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个人传播相互渗透、相互叠加的过程,在这一复杂互动过程中,媒介性(文本性、互文性、中介性、超中介性)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媒介与人、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一方面媒介被置于其他两者的话语境中,同时又影响其他两者的话语境,这种关系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媒介被置于社会的话语境之中,另一方面社会又处在媒介的话语境之中,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嵌套。即作为环境的媒介与作为媒介的环境同时存在着。

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人际交往、人参与社会互动、人维系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人与社会的意义共享等方面。在媒介化社会中,人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性实现上述互动,表现在人通过媒介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参与媒介文本的意义建构,人在媒介消费中获得快感,人通过媒介学习获得知识,人的生活与媒介紧密结合等方面。

社会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体现为社会与媒介互为语境，民主政治体制通过媒介反映民意诉求，维系社会过程、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良性互动需要媒介的参与，维系社会伦理价值、社会秩序需要媒介的参与，社会危机治理需要媒介的参与，国际社会与全球传播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文化在“媒介—人—社会”分析范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人、社会与媒介的互动一般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结构中进行的，既受其约束，也是其组成部分，又为文化结构的演变提供动力。其次，人与社会的互动也是在一定的文化结构中进行的，受其制约；与此同时，互动的方式和内容成为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为文化结构的演变提供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在结构上确定了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媒介层次主要考察民族地区或特定地域中各类媒体及其所提供的服务状况；社会层次主要考察地域社会或区域社会变迁中的媒介影响；人的层次主要考察现代社会信息环境、媒介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状况；文化层次主要考察与媒介及其传播有关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形态。

正如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多数调研成果在研究取向、分析视角、关注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与超越。这种创新与超越也反映出近几年我们在学科培育、学科建设上的一种新思考、新认识。

本学科自2009年以来先后得到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学科培育和建设项目的资助，本着“主流、特色、前沿、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建设理念，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

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应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知识创新、队伍建设、学科发展、服务社会这五个基点来进行，本学科的培育和建设也不例外。在学科培育与建设的初期，由于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从现实条件出发，试探各种可能的路径，在摸索中使学科培育和学科建设的思路逐步清晰起来。但是如果长期缺少“顶层设计”的意识和理念，埋头于各种技术性、策略性、方法性的探讨，不仅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更有可能出现战略性、方向性偏差。我们认为，在学科建设与学科培育的初期，较为清晰的“顶层设计”理念十分必要，同时也需要在路径、方法、手段上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学科培育和学科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意识和理念，更需要在“知己

前　　言

知彼”的基础上进行战略性谋划,在学科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凝练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学科建设方向和路径。目前,全国已有数百所高校设立了新闻传播学专业或相近专业,在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思路上出现了同质化趋向。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学科发展,也不利学生就业,更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学科建设在“走正道、入主流”的同时,更要体现出特色。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信息化、社会媒介化、媒介融合化、传播全球化趋势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其社会应用研究的广度、深度也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学科培育和建设更应着眼于未来,在未来发展的大势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具体来说,就是学科建设思路在体现“主流”和“特色”的同时,还要具有“前沿性”、“前瞻性”,要使本学科在即将到来的专业竞争、学科竞争、人才竞争中依然保持“可持续发展”。而要落实这些思考,关键是要尽早地选好、培育好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交叉点”和“聚合点”。

学科培育的生长点是指学科建设起步阶段或学科发展过程中,根据需要选定的一批符合学科发展方向、具有生长潜力和带动效应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生长点具有基础性、成长性、衔接性特征,生长点也是提升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社会服务水平的基础,在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中能够发挥支撑作用。立足现有的学科基础和专业优势,适时地选好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并加以培育,这关系到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发展空间是否广阔。

学科培育的交叉点是指本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之间、理论创新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好的交叉点可以成为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也是提升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社会服务水平的基础平台。选择、培育交叉点是学科发展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学科建设首先要确定本学科的定位,其次要确定本学科的发展路径,这必然涉及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选好交叉点,就是根据“主流、特色、前沿、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建设原则,尊重学科之间的自然联系和融合规律,在主要条件基本成熟时,从现有的研究资源和社会需求出发,适时地确定若干个学科结合点并加以培育。总之,生长点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交叉点是学科发展的路径,选好交叉点,关系到学科建设的整体布局,也关系到学科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学科培育的聚合点是指参与学科建设和学科培育项目的团队成员之间,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课题层面上形成的内部交叉与融合点。选好聚合点,

需要在尊重、支持每位创新团队成员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的基础上，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适时、合理地引导团队成员围绕交叉领域、共同课题、共同难点，凝聚集体智慧、形成学术创新的合力，从而在重要领域、重要方向、重要课题上实现突破。适时、恰当地选好聚合点，是确保学科培育与建设取得战略性突破的关键。

选好、培育好生长点、交叉点和聚合点，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学科建设、学科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相对而言，在学科建设的前期，对生长点的选择和培育尤为重要；在学科建设的中后期，对交叉点、聚合点的选择和培育尤为重要。学科建设有了以上策略还不够，还需要在战略层面进行思考。

经过近几年来学科培育与建设的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科学地确立和培育研究方向、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是提升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社会服务整体水平的关键。在确立和培育研究方向、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我们从“顶层设计”角度对学科培育与学科建设又有了进一步思考。

第一，本学科应从单一的新闻学研究，向主流的、有特色的当代新闻学研究转变。当代新闻学研究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新技术革命挑战和社会整体转型挑战，也为新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全球化挑战促使新闻学研究开辟了跨文化新闻传播等一批新的研究领域；新技术革命挑战促使新闻学研究开辟了全媒体新闻传播、网络新闻实务等一批新研究领域；社会整体转型挑战促使新闻学研究开辟了新闻社会学、新闻法与新闻伦理、新闻文化学、专业新闻报道等新研究领域。

上述新领域对于培育新闻学研究的生长点、交叉点、聚合点具有重要意义。从本学科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我们认为应从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全媒体新闻传播实务、新闻法与新闻伦理研究、专业新闻报道研究等领域，确立学科培育的生长点、交叉点，带动新闻学的整体研究。

第二，从新闻传播学本体研究，向以新闻传播学为中心、辐射信息传播相关领域的研究转变。众所周知，信息革命推动了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革命既是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一方面，当今社会已经高度信息化，在信息泛在化、媒体平台化的今天，新闻的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传播路径以及受众对新闻的认知、解读方式都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另一方面，专业新闻媒体与社会性媒体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新闻传播在融入信息传播洪流过程中也使自身的内涵、外延和价值发生改变。当今的新闻价值只有在信息传播

前　　言

中才能完整地得到体现,当代新闻传播的规律也只有在信息传播研究中才能完整地被揭示出来。因此,在信息传播研究中拓展新闻传播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是深化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信息传播研究可立足现有基础,培育生长点、交叉点和聚合点。

第三,将社会信息传播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延伸和拓展,有意识地培育生长点。首先,媒介化社会崛起后,信息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性渗透日益显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信息传播的依赖性与信息传播的交融性都日益增强,各类媒体的社会功能只有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在多元的社会语境下才能准确定位、客观评估。其次,新闻传播融入信息传播洪流后,使其更加广泛、深度地融入社会互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演变中,在其中发挥着新功能,扮演着新角色。社会信息传播研究更重视新闻媒体、社会性媒体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视新闻媒体、社会性媒体在主流社会、民族区域社会的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公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核心价值构建、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公共治理结构的优化)中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开辟社会信息传播研究,可以拓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再次,随着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崛起,作为社会传播的雏形,社会成员对信息传播的参与更加广泛,围绕社会热点、公共议题而展开的社会互动日益频繁,并且进一步影响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演变。新闻生产的公众参与、新闻文本的社会化建构不断涌现,并与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形成复杂互动。这预示着真正的社会传播时代已经到来,需要对其展开专门研究。第四,社会性媒体出现以前,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军事信息、政策信息、生活信息、环境信息等专门信息的生产、流通,大多依附于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特定媒体,公众对社会信息的共享大多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新闻舆论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巨大。社会性媒体崛起后,信息生产、流通的固有空间被打破,社会成员对各类信息的共享成为可能。各类信息在碰撞、交汇、融合中形成巨大的社会信息空间,其内在的传播规律也不同于已往,社会信息传播作为新兴的独立研究范畴即将得到确立。为此,应有意识地为社会信息传播研究选好生长点,以便为今后的学科交叉研究、聚合研究打好基础。

第四,从媒体本位的研究取向,向媒体与人并重的研究取向转变,有意识地培育生长点、交叉点。首先,当今社会,人类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地位日益增

强，人与媒介环境、信息环境之间的能动性互动日益频繁，人对媒体和信息的选择权日益扩大。其次，人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多维度复合主体，面对不同的媒介环境，其信息行为既有差异性、多样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可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展开研究。再次，人体及人的行为本身是一个由生理、心理、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系统，这使得人类信息传播区别于社会信息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需要特殊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第四，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人的发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瓶颈”，人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在人的公民素养培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人的信息行为与人的社会生存、全面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加强对人类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可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与社会重建。第五，人类信息传播研究与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交叉点，存在着形成重大理论创新的潜力和可能。综上，人类信息传播研究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个学术分支，已到了培育生长点的机遇期。

第五，重新认识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复杂关系，培育生长点、交叉点。从表层上看，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是传播载体与传播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社会信息环境（包括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法制、信息文化等环境）的制约，而社会信息环境的改进和优化，也会提升媒体传播民族文化的广度、深度和效率。从深层看，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其中，传播是实现这种建构和被建构的前提。民族文化在通过媒体实现传播之前，需要在信息编码基础上实现文本化，而文本化就是一个建构（编码）的过程，其中既有媒体的作用，也有文本生产者的作用；当媒介文本经过传输网络抵达受众或用户时，受众或用户还会参照特定的语境和其他文本，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解码），这种解读也是一种社会化的建构；当承载着文化信息的媒介文本抵达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受众或用户时，后者对文本的解读就具有了跨文化建构的作用。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还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建构关系。一种是纪实性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这种建构旨在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和本来面貌，基于这种建构的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扩散、文化流传过程。文化人类学、媒介人类学较为关注此类建构，写实类、纪实类文本的传播属于此类。另一种是创造性建构或创意性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这种建构是将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入新的文本框架，实现民族文化在内

前　　言

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基于这种建构的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创新、文化创意的传播过程。文化创意学、创意传播学较为关注此类建构,虚构类、艺术类文本的传播属于此类。二者对民族文化传播都具有意义,应选好生长点、交叉点,并给予培育。此外,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关系。媒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可以丰富这一文化的形态和结构,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也可以丰富媒体文化自身的形态和结构,促进媒体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媒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播是价值生成、价值转换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文化艺术价值、产业经济价值既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大众获得精神文化上的享受。

上述五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既有可能出现积极、良性的互动,也有可能出现消极、恶性的互动。揭示这种复杂关系的本质特征需要在多学科语境下,选好生长点和交叉点,组织团队展开研究。

第六,重视当代大众传播研究,有意识地培育生长点、交叉点。首先,在网络时代,以广播、电影、电视、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传播功能、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大众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大众传播深度融入网络空间的趋势日益明显,迫切需要在媒介融合发展、数字内容经济、微时代等多重语境下重新考察大众传播,揭示其在主体上、结构上、功能上、效果上的本质变化;其次,大众传播理论在当今媒介化社会、网络化社会中遇到了许多新挑战,这也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迫切需要通过实证的、规范的研究,揭示其最新发展和最新应用;再次,大众传播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传播形态,其社会影响力借助新媒体、新平台、新服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对于传播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公民社会建设、多元文化社会建设、法制社会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研究当代大众传播的最新变革和大众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既是学科发展自身的需要,也是服务社会特别是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

以上思考只是初步的,还需要在今后学科建设的实践中,在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碰撞中,不断修正以至完善。一个好的“顶层设计”需要时间和过程,但这不会妨碍我们从实际出发,立足现有条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探索前行。目前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一批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并根据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自然联系和现实需要,初步确定了若干交叉研究领域及课题作为学科发展

的交叉点。通过实际组织课题研究,加强对课题的引导,推动课题间的交流等措施,使学科培育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本书汇集的十几篇调研报告分别在四个层次上进行了考察,其中有很多新发现、新思考,也反映出思路调整后,在研究视角、研究方向、研究选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做出的一种新尝试。其中有些调研报告反映了独立生长点所取得的成果,有些调研报告则反映了交叉点所取得的成果。应当看到,各个调研报告所代表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研究取向是多元的,这正是学科培育与建设的生命力所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在新的层面上形成互动与交叉,其中一部分研究项目可能会形成天然的聚合点,而另一部分研究项目则可能继续独立生长。无论哪种结果,在正确的组织和引导下,都是对学科培育与学科建设的有力推动。相信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本专业的科学的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社会服务水平也将得到提升。

编 者

2012年5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地域主流媒体与政治文化生态

广播电视台与多元文化社会建设	张志等	3
新闻传播与西藏地区的国家认同	刘立刚等	87
重庆卫视“主流媒体公益频道”考察	刘瑾鸿等	131

第二部分 当代媒介环境与人类信息传播

信息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云南腾冲调研报告	汪露等	169
满洲里地区老年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考察报告	张芝明等	235
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媒体使用现状调查研究报告	范小青	266
儿童与新媒体:2011 年度调研报告	刘卫华等	316
西北地区民族院校新闻传播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王晓英等	390
关于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王晓英	432

第三部分 新媒体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

手机对游牧民族的影响调研报告	岳广鹏等	441
少数民族村落的边缘化社会生活与现代媒介的影响	陈俊妮	483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受众调查报告	赵五星	508

微博营销传播:发展现状与趋势 杨超等 543

第四部分 跨文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

主流影视在民族地区的传播现状调研报告	吕乐平等	579
云南少数民族视觉文化素养与传播现状调研报告	郭梅雨	633
云南腾冲傣族服饰文化现状调查报告	汤文靖等	705

第一部分

地域主流媒体与政治文化生态

广播电视台与多元文化社会建设

——内蒙古兴安盟地区广电媒体及其社会服务考察报告

课题组组长 张 志

课题组成员 李 光 海耀霞 包 扬

汪 丽 刘海燕 姚 旭

孔大为 瞿 慧 薛 蕾

张雪薇 马立德 刘 娟

安娜丽

一、前言

多元化是当代欧美重要的哲学思潮，这种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象征着一元论的文化霸权逐渐没落。20世纪末的传播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信息得以快速、大量地扩散，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本土意识”、“地域意识”和弱势群体意识的醒觉，在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外来族群与原住民的权益冲突就是弱势族群或社群冲突的实例。与这一背景相呼应，“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观点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之显学。

多元文化主义旨在讨论：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里，不同文化的族群团体，应该建立一个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社会，以避免激烈的族群纷争。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描述多元族群存在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主张发展“多元文化政策”，以有效维护弱势族群的文化权益。因此多元文化论者强调在传播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促进有效、平等的传播参与，应更加强调少数团体接近使用权的重要性。